



传承胶东根据地的革命精神

□ 卓成霞

胶东，系指胶莱河以东的山东半岛地区，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较早地区之一，是缔造红色文化的重要沃土。尤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无数英烈曾经在这块土地上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流血牺牲，为中国革命和民族独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胶东半岛三面环海，一面沟通冀鲁平原，水陆交通便捷，物产富庶，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因为胶东的地理与资源优势非常重要，日本法西斯侵华的战略计划中，一直把胶东作为往来海上与华北之间的重要通道和“以战养战”的补给基地之一。罗荣桓当年率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挺进山东以后，曾意味深长地说：“胶东是未上到枪身上的一把刺刀”。随着胶东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八路军巩固和扩大了昆崙山、大泽山根据地，大大改变了胶东战略局势，使胶东这把刺刀上到了枪身上。

胶东地区具有悠久的革命传统，特别是近代以来，胶东地区爆发了多次反帝反封建的自发斗争，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孕育了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早期领导人王尽美、邓恩铭、邓中夏、王荷波等先后来到胶东，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工人群众中做了大量宣传工作，汇聚革命力量，燃起胶东人民革命的希望和曙光。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胶济铁路工人自发举行大罢工、青岛日商纱厂工人举行同盟大罢工，胶东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帝爱国洪流，革命火种熠熠生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胶东党组织呈现多渠道发展之势。1935年11月29日，胶东特委根据团省工委指示，发动了“一一·四”农民武装暴动，但因为准备工作不够充分等原因惨遭失败。但胶东党组织注意吸取教训、积累经验，继续推动革命。1937年12月24日胶东党组织在天福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以昆崙山红军游击队为骨干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自此胶东抗日的大旗高高飘



胶东抗日烈士纪念馆



胶东抗日烈士陵园烈士墓区



第五支队成立大会 八路军山东纵队胶东

扬。1938年黄县、蓬莱和掖县的三支抗日武装也发动了大规模起义，这些革命活动为胶东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胶东根据地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白手起家创建的，是有伟大成绩的模范根据地。1938年3月12日在掖县（今莱州市）成立的抗日民主政府，是山东第一个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紧接着蓬莱、黄县相继建立民主政权，三县连成一片，且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动了7000多人的抗日武装，形成了胶东革命蓬勃发展的大势。1939年5月13日，中央专门发出《中央关于胶东工作的指示》，认为胶东“年余发展了数千党员，创造了六、七千人的党领导的队伍，这是伟大的成绩”，

并要求“建立胶东的坚固的抗日根据地”。这一重要褒奖与具体指示为胶东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战略要地奠定了基础。同年12月6日，中央在《关于山东及苏鲁战区工作的指示》中进一步明确了胶东抗日民主政权的任务和发展方向，提出：“在我们领导下的某处政权（如胶东三县）应该成抗日民主政权的模范区，极力扩大其影响于全省全国”。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胶东根据地铸就了伟大的革命精神。始终坚持党的坚强领导。从1942年到1944年的3年间，胶东军民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反“扫荡”、反“蚕

食”，反封锁，英勇抗击日、伪、顽的联合进攻，巩固和扩大了胶东根据地。抗战期间，胶东八路军部队对日伪军作战7000多次，攻克日伪军据点425处，毙伤俘日伪军134万人，给不可一世的日寇以迎头痛击，使年轻的山东八路军声威大振。在中国共产党坚强、正确的领导下，胶东抗日武装不断取得胜利，不断发展壮大。生死相依的军民深情。胶东革命武装是依靠严明的群众纪律，在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作风中建立起来的，八路军和人民是鱼和水的关系。我们党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一扫旧政权的一切恶习，县长和通讯员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食，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1942年是抗日根据地最困难

的一年，日军以15万余兵力对胶东根据地进行“拉网合围”大“扫荡”。胶东人民大力支援我军作战，他们当向导、递情报、送给养、挖地道、隐藏军用物资、掩护与疏散伤病员，表现了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比如，当时部队的女同志和地方工作的妇女同志多数剪了短发。敌人在“扫荡”中，见到妇女就查头发，专门抓捕杀害装扮有假发髻的妇女。在妇救会的动员下，胶东几个县的妇女纷纷剪掉发髻，使敌人真假难辨。更不能忘却的是，抗战中八路军将士为掩护百姓舍生忘死的感人故事。缅怀历史，革命成功的密钥源自于军民唇齿相依的互相托举。

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胶东抗日烈士纪念碑碑文》这样记载：“八年来，胶东人民子弟兵的历史，就是同敌人进行血战的斗争史，也是无数先烈英雄们为人民、为民族而流血牺牲的奋斗史。”胶东根据地是我军最大的兵源地之一，粟裕曾这样评价胶东扩军和群众积极参军：“胶东许多地方，把壮丁一律集合，由公家挑选。”在解放战争期间，山东发动四次大参军，共近60万名青年参军，其中胶东近30万名，占全省48.4%。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发展为规模最大、战绩最辉煌的战略集团，胶东兵员的贡献功不可没。在革命战争中，很多来自胶东的子弟兵英勇战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1982年7月《山东省革命烈士基本情况统计资料》统计，全省一共22万革命烈士，如果按当年胶东行政区的辖区计算，胶东有烈士7万多人，无数先烈的忠骨英魂，凝聚成胶东大地上最震撼人心的红色记忆。

无私奉献的担当精神。胶东根据地较早认识到兵工生产的重要性，抗

战后后期形成较大规模。刘少奇曾指出：兵工同志的工作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条件之一。为了及时修复损坏的枪支，1938年3月，“第三军”第一大队在文登李家庄村建立了六人修械所。在攻克掖县后，筹办了一座小型兵工厂，开始修理枪支，后造过小炮。胶东第一兵工厂就选址在黄县县城东南的圈杨家。罗荣桓曾向中央专门报告胶东、鲁南兵工和胶东炮兵的情况，报告在汇报鲁南生产能力时，使用了“每月”的概念；在汇报胶东的生产能力时，则使用了“每天”的概念，胶东火药、炸药的产量相当于鲁南的46倍。解放战争期间，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对胶东兵工的依赖程度极高。陈毅、粟裕曾电文，公开点名要胶东供给战场物资。1947年8月23日电：“胶东为我全军军事供应之主要基地”；8月26日电：“华野数十万军队之炮弹、炸药及子弹供应，至少十分之七依靠胶东”。1950年山东省在《关于一九四九年兵工工作总结报告》中披露：“胶东在此期间共生产迫击炮弹200万发，占80.2%；炮490门，占72.4%；钢炮弹全部为胶东造；子弹518.5万发，占53.3%；整个解放战争期间，胶东共生产各种炮弹252.8万发，相当于3次淮海战役再加15次孟良崮战役的消耗量，产量超过关内各大军区。”由此看出胶东军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突出担当，是胜利之师的强大后盾。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革命根据地是初心永恒的营养剂，红色基因是担当使命的催化剂，赓续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红色记忆

南朝名将韦睿的作风

□ 王春雷

善读史书的毛泽东，非常看重和称道的一个历史人物叫韦睿。《南史·韦睿传》是他批注最多的历史人物传记。他在《南史·韦睿传》的天头特意标注了“梁将韦睿传”几个字，在该传中的批注就多达24处。毛泽东说他善于调查研究，会打仗；赞扬他豁达大度，能够团结将士；称赞他谦虚朴素，廉洁克己。毛泽东在批注中特别写道：“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韦睿（442—520年），字怀文，京兆杜陵人，是南朝梁武帝时名将。他生于乱世，出身望族，自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年少时就以才学、廉洁闻名。刘宋、萧齐两朝，政局混乱，韦睿冷眼旁观，不露锋芒。南齐末年，萧宝卷奢侈淫逸，宠信奸臣，滥杀功臣。而韦睿独具慧眼，暗中结交雄才大略的雍州刺史萧衍，趁势而起，成为南梁的开国功臣。在毛泽东看来，韦睿这个历史人物至少有三点可贵作风，值得干部学习。

躬自调查研究的作风。毛泽东认为韦睿会打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具有躬自调查研究的作风。韦睿一生指挥过很多战斗，每次都亲临战场进行调查研究。天监四年（505年），合肥之战打响，韦睿先派王超宗、冯道根率兵进攻北魏的小岷城，久攻不下，“睿巡行围栅”，亲自到小岷城视察敌情。这时，只见小岷城城门洞开，魏军数百人出城列阵，韦睿想发动进攻，但部将们都不赞成，他们认为准备不足，如果要进攻，得先回营穿上铠甲再说。韦睿说：“魏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保，无故出入于外，必其骁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韦睿见部将仍犹豫不决，便拿出符节说：“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睿之法不可犯也。”于是突然发起进攻，一鼓作气拿下小岷城，为夺取合肥扫清了障碍。毛泽东在“睿巡行围栅”处批道“躬自调查研究”。

韦睿攻克小岷城后，便率军进攻合肥。韦睿的右军司马胡景略在韦睿之前便率部到了合肥，但多次进攻不



下。韦睿到达后对合肥周围的地形地貌进行了仔细观察，然后对部将们说：“我听说‘汾水可以灌平阳’，就和这一样。”于是下令梁军筑堰拦截肥水，把水灌到合肥城下。韦睿率军先攻克合肥城东、西两旁的两座小城，稳定部队的情绪，然后，他派出梁军的战舰，直抵合肥城下。因合肥城被水淹灌，梁军战舰与城头的高度相同，因而梁军最后攻破了合肥。毛泽东在“睿案行山川”处又批道“躬自调查研究”。

豁达大度，团结将士的作风。钟离之战是韦睿以数万胜敌百万的经典之作。钟离之战后，征北将军曹景宗和其他将领都争先恐后地向朝廷告捷，而韦睿“独居后”，从不与他们计较。在钟离战争中被救的北徐州刺史昌义之，为了报答韦睿和曹景宗的救命之恩，特拿出20万钱设赌，让他俩赌输赢。韦睿赢了，却故意重掷一次，输给曹景宗。毛泽东在此处批道“使曹景宗胜”。他认为“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韦睿不仅豁达大度，而且还善于团结将士。在合肥之战中，韦睿的右军指挥官胡景略和前线指挥官赵祖悦发生了冲突，彼此都想找机会陷害报复对方。韦睿认为，将帅不和会带来大的祸患，便亲自调解。他知道问题的关键在胡景略，于是先做胡

景略的工作，亲自给他斟酒，请求说：“我希望两位虎将不要再私斗。”晓之以大义，最终调解了两人的矛盾，使整个战役进程没有受到影响。毛泽东在此处批道“干部需和”。

谦虚朴素，廉洁克己的作风。韦睿谦虚朴素。作为主将，韦睿日常工作非常繁忙，但仍谦虚朴素。他白天要接待各种客人，晚上则要考虑军事问题，常常三更起床，一直工作到天明。即使如此，他待人接物仍非常客气，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前来投奔他。毛泽东在此处批道“劳谦君子”。韦睿又以仁义御下，以慈爱待亲，以仁礼侍朝廷，不改谦虚朴素之本色。史书记载，他对待下属，“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并灶未成，亦不先食”。对待家人，他“事继母以孝闻”，“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在朝廷上，对皇上“恂恂未尝忤视”，对百官谦虚有礼。梁武帝“甚礼敬之”，曹景宗为个人争强好胜，在公卿面前从不谦让，唯独敬重韦睿。韦睿年轻时就以为官清廉出名。他的表兄杜幼文担任刘宋政权的梁、南秦二州刺史，请韦睿一起赴任历练。据《宋书》记载：“幼文所莅贪横，家累千金，女伎数十人，丝竹昼夜不绝。”而韦睿在他身边，却能出淤泥而不染，以廉洁克己而知名。合肥之战，梁军大获全胜，缴获大量物资，而韦睿却毫无保留充作军饷，不取分毫。钟离之战大胜，缴获的物资，韦睿如数交予劳军使者，上报朝廷。毛泽东在此处批道“不贪财”。韦睿晚年辞官回家，“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

毛泽东熟读《二十四史》，读书见识，独冠天下，对古之名将多有点评。在毛泽东点评过的古代名将中，韦睿格外被他看中，概源于他具有好的作风。



自得园

过了清明节，紧接着下一个节气就是谷雨了。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有一首咏谷雨的七言诗：“不风不雨正晴和，翠竹亭亭好节柯。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几枝新叶萧萧竹，数笔横斜淡淡山。正好清明连谷雨，一杯香茗坐其间。”诗中表达了在不刮风、不下雨的谷雨时节，翠竹刚刚吐出新叶，傍晚微凉，友人到访，与之论诗作画、品茶赏竹的美好心境。

谷雨与其他节气一样，在我国也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谷雨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六个节气，每年4月19日至21日视太阳到达黄经30°时为谷雨，源自古人“雨生百谷”之说。如明代介绍栽培植物的著作《群芳谱》所言：“谷雨，谷得雨而生也。”作为春季最后一个节气，谷雨的到来意味着寒潮天气基本结束，气温回升加快。谷雨时雨水增多，大大有利于谷类农作物的生长。民间农谚有“谷雨时节种谷天，南坡北洼忙种棉”“谷雨前后，种瓜点豆”等句。

我国古代将谷雨分为三候：“第一候萍始生，第二候鸣鸠拂其羽，第三候为戴胜降于桑。”这是说谷雨后因降雨量增多，水面的浮萍开始生长，接着布谷鸟振翅飞翔，开始提醒人们播种，然后是在桑树上开始见到戴胜鸟了。唐代诗人元稹的《咏廿四气诗·谷雨三月中》，也形象地描绘了谷雨节气的物象：春光晓，山川黛色青。叶间鸣戴胜，泽水长浮萍。暖屋生蚕蚁，喧风引麦莖。鸣鸠拂拂羽，信矣不堪听。谷雨时节的南方地区，“杨花落尽子规啼”，柳絮飞舞，杜鹃夜啼，牡丹吐蕊，樱桃红熟，自然景物告诉人们：时至暮春了。唐代诗人孟浩然在《春中途中寄南巴崔使君》诗中云：“旅人游汲汲，春气又融融。农事蛙声里，归程草色中。独

惭出谷雨，未变暖天风。子玉和予去，应怜恨不穷。”谷雨时节的郊外风光，水面景色，不紧不慢的农事活动都跃然于纸上。“谷雨毋须添国色，江南上已杜鹃看”，这是现代诗人吴藕汀写的《谷雨》诗中的两句，给人以联想，烘托出谷雨时节的江南美景、浓浓春意。

谷雨正处于春夏之交时期，也是新茶上市之际，诗人们常会围坐品茗吟诗。北宋诗人林和靖在《尝茶次寄越僧灵皎》一诗中写道：“白云峰下两枪新，腻绿长鲜谷雨春。静试恰如湖上雪，对尝兼忆剡中人。瓶悬金粉师应有，筋点琼花我自珍。清话几时搔首后，愿与松色劝三巡。”唐代名家陆希声在《阳美杂咏十九首·茗坡》中也有“二月山家谷雨天，半坡芳茗露华鲜。春醒酒病兼消渴，惜取新芽旋摘煎”的诗句。谷雨时节，饮上一杯新茶，不但能够消渴，还能醒酒提神，也是文人雅趣的体现。

在很多写谷雨的诗词中，宋人范成大的《蝶恋花》写得最有特色：“春涨一篙添水面。芳草鹅儿，绿满微风岸。画舫夷犹湾百转，横塘塔近依前远。江国多寒农事晚。村北村南，谷雨才耕遍。秀麦连冈桑叶贱，看看尝面收新茧。”这首词上阕写诗人泛舟湖上，微风拂过，观两岸绿意葱茏、近依前远的风光；下阕写农人的生活，谷雨时方才耕完村南村北的土地，这时水稻播种了，麦子抽穗了，一派谷雨时节清新、明净的水乡春景，诗中散发着浓郁而恬静的农家生活气息，抒发了诗人亲近自然的悠然情怀。

正好清明连谷雨

□ 张坤